

巫仁恕 · 康豹 · 林美莉 主編

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錄

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

都市生活與文化

民國時代北京的洋貨與商人日常生活.....鄭曉敏 1

清代洋貨的流通與城市洋拼盤(mosaic)的出現.....鄭南文 37

女性消費與消費女性：以近代上海百貨公司為中心.....鄭曉敏 73

「有心思」：民國時期上海的電力球賽.....張季 85

從遊戲到旅遊：16 巫仁恕・康豹・林美莉 主編.....巫仁恕 113

20 世紀初的蘇州的花柳區.....柯芝德(Peter I. Carroll) 151

上海公共租界與城市動力.....張季 163

租界國際與城市動力.....張季 163

「房客聯合會」與 1920 年代上海的房租減租運動.....鄭曉敏 171

民國時期向美國與向地方政府請願：.....

以成都市茶社信託同盟公會為例.....王蕾 197

法律與民間：民初上海租界內丹、城市警察的修訂.....

「印刷文化與國體」.....劉凱 201

飛躍、想像與附庸：鄭曉敏與上海.....鄭曉敏 217

一個著名上海商人的慈善事業.....康豹(Paul Katz) 273

城市精英與城市文化：周餘利與 1930 年代的興起.....徐小傑 297

近代中國本土會計師執業空間的.....

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為例.....1945.....林美莉 327

在表演和宣傳之間：上海民衆企業職員的慶祝活動.....

群眾運動，1940-1932 年.....楊慶堃 361

索引.....39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編。--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所，民 99.03

面； 公分

含索引

ISBN 978-986-02-2868-7(平裝)

1. 都市 2. 近代史 3. 文集 4. 中國

545.1092

9900540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

主 編／巫仁恕、康豹、林美莉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27822916・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82278766

初 版／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定 價／平裝新台幣 5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平裝) ISBN 978-986-02-2868-7 GPN 1009901142

導 論

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

巫仁恕**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演變歷程中，城市無疑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從明清以來，尤其是到 19 世紀中葉以後，城市的數量逐漸增多，規模也逐漸擴大，如此快速的城市化現象標誌著一種新時代的到來。這種情況相對中國農村長期趨近停滯的發展，形成了強烈對比，更凸顯城市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此外，在思想方面近代的城市是新觀念發展的溫床，同時也是新事物的實驗場，更是國家稅收財源的重要基石。由是，在探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與變遷時，不但無法規避城市的重要性，而且從城市史的角度，適可以提供探索歷史變遷更多、更重要的線索。

近現代中國城市史歷經數十年的發展，早期是由現代化的角度出發，從研究城市建設、城市規劃、城市行政管理與城市衛生等面向，進而探討城市與國家的關係、城市社團的自治性等課題，為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臺灣有關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相對於歐美與大陸學界來說，並不算突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過去曾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雖然並非以城市為研究重點，卻也留給我們許多寶貴的遺產。立基於前輩的研究，本所於 2005 年 4 月正式成立城市史研究群，並於 2007 年 6 月 28 至 29 日召開「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學術討論會，本書即是此次會議的成果。

本書用現代性來取代現代化，無論喜不喜歡這個名詞，我們都不能否認當時整

* 本文的完成除了要感謝本所城市研究群的所有同仁之外，特別要向當時擔任會議總結討論的高彥頤教授致謝；本書送審後又得到三位審查人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個社會對「現代性」的追求。現代性在城市裡的表現特別明顯，而城市化又是現代性的一部分，兩者是互相含攝的。本書透過城市來探討現代性的問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嘗試突破現代化或西化的框架，擴大視野與議題到其它的面向，並且將近現代城市史研究的縱深，延伸到明清時期。

從現代化到現代性：近代中國城市研究的範式轉移

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城市化，而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也是由此角度出發。西方學者早在 1950 年代起，便開始留意近代中國城市的研究，Rhoads Murphy 率先將上海城市視為近代中國變革的中心，接著有謝諾 (Jean Chesneaux) 研究近代工人和城市無產階級、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分析商人與資產階級、伊懋可 (Mark Elvin) 探討上海士紳的權力消長。進入 1980 年代以後，隨著中國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學界逐漸將研究焦點從毛澤東強調的農村革命轉移到過去被忽視的城市，於是城市史的研究更形蓬勃。如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對漢口城市社會史的研究、David Strand 探討北京的社會階層與公共領域；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論上海工人的罷工、韓起瀾 (Emily Honig) 與賀蕭 (Gail Hershatler) 分別研究上海與天津的女工；梁元生關於上海的道台、馬丁 (Brian G. Martin) 研究上海的青幫、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研究《申報》；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探討上海市政的權力運作，且與葉凱蒂 (Catherine V. Yeh)、賀蕭等人都有關於城市妓女的研究；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關於上海的警察與黑社會，以及程愷禮 (Kerrie L. Macpherson) 關於上海的公共衛生之研究等等。¹

中國大陸關於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在 1980 年代以後逐漸形成風潮。上海、武漢、重慶與天津是四個城市史研究的重鎮，其中又以上海的研究最為熱鬧。中國大陸研究近代城市史時，同樣地強調城市對中國「現代化」或「近代化」所發揮的作用。例如著名的史家張仲禮就聲稱：「東南沿海城市與內地城市的聯繫同時具有集散和輻射的雙重功能。這些功能的發揮就是對中國近代化的推展。」² 隗瀛濤在《近代

1 參見 Christian Henriot, "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 Literatur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1 (1996 年 3 月)，頁 151-175。

2 張仲禮，〈關於中國近代城市發展問題研究的回顧〉，收入張仲禮、熊月之、沈祖煒主編，《中國近代城

重慶城市史》的緒論中，也認為近代中國城市研究有兩條相互推進，又互相制約的主線，即近代城市化與城市近代化。³

所謂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意指客觀的工業化發展，會帶動資本主義的興起，繼而帶動政制體制變革的理念。這一大套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理念，背後的假定是：現代歐洲發展起來的現代文化和制度，將最終為所有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和現代社會照單全收，隨著現代化的擴張，西方現代文化將在全世界流行起來。然而，90年代以後，有愈來愈多的研究傾向以「現代性」(modernity)來取代「現代化」一詞，背後反映的是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逐漸意識到過去現代化理論的偏見而有的一種反動。如顧德曼(Bryna Goodman)對於會館與同鄉會的研究、關文斌研究天津的鹽商與城市社會、羅芙芸(Ruth Rogaski)關於天津的公共衛生等。⁴這些研究都讓我們重新了解近代中國城市內變遷的各個面向，尤其是通商口岸的大城市上海，更成為研究的重心。近十年來的研究又擴大到其它城市，如廣州、哈爾濱、成都與南通等地，並且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城市住民的日常生活，都有更新的研究問世。⁵然而，這些作品仍無法完全跳脫所謂「國家／社會」的分析模式，以及「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詮釋方法。

雖然，現代化理論對研究者而言已逐漸從接受走向抗拒，可是對於現代性的定義也未有定論。西方歷史學界對現代性就有許多不同的解釋，籠統地說，現代性已經成了政治、社會、思想、經濟、技術與心理等多多元因子的混合體，而這些因子可以上溯到16至19世紀之間。⁶暫且就用一個較模糊的說法，現代性就是近數百年

市發展與社會經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9。

3 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緒論」，頁12-15；有關中國大陸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回顧，可以參考劉海岩，〈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頁14-30；鐘建安、陳瑞華，〈近年來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綜述〉，《社會科學評論》，2007年第4期，頁114-119。

4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5 最近十年來歐美學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見Charles D. Musgrove, "Review Essay: The Nation and Daily Life in Modern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3: 4 (May 2007), pp. 620-632。

6 這些因子包括了自由與民主國家的興起，以及具有支配優勢的世俗化、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消費心態與科學主義等。參見Michael Saler, "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 A Historiographic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3 (Jun. 2006), pp. 692-716。

來，文明為面對時代的變化（無論這些是來自外部或內部），所作的自我調整。

現代化所帶來的一些便利的物質以及刺激的感官功能，例如近代城市所提供的「光、熱、力」，的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而令當時人著迷。人類學家從物質消費的角度所作的探討，指出現代化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應該有所區別。所謂的「現代性」強調的是人們在歷史過程中集體經驗的主觀認知，是一種強烈地感覺自己屬於現在，並與過去所習慣的傳統產生斷裂的認識，也就是一種與過去對立的強烈「現在感」。⁷所以，研究者在考量現代化的時候，還要注意到當時人主觀上是追求或抗拒。從這個角度提醒我們在觀察歷史時，不只是探討客觀的現代化現象，更應該要注意到當時人的感受。同時也提醒我們在近現代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現代性並不只是出現在特定的某一時間、某一群知識分子、某一群政治人物，而是還有很多不同層次、更複雜的現代性，甚至還有許多擺在現代社會裡非現代的動作、活動與追求在裡頭。

David Strand 在周錫瑞（Joseph Esherick）主編的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 to 1950* 一書末章中，精闢地道出近代中國城市的特徵是一種新與舊的互動，包括新的科技與舊有習慣的互動。過去的學者常用新與舊、傳統與現代這樣的二元對立觀點，來看近代中國城市，反而會掩蓋了城市裡廣泛地合作與融合的特徵。⁸近年來顯著地受到學界注意之「多元現代性」（multiple-modernity）的觀念，修正了 1950 年代早期現代化理論。其最重要的含義之一，是指出現代性不同西化；而且現代性的西方模式，也不是唯一「真正的」現代性。非西方社會可以挪用最初西方現代文明社會的特定主題和制度，透過持續不斷的選擇、重譯和重構，將現代性的某些西方的要素整合到自己新的集體認同的建構之中，而不必放棄他們傳統認同的特殊成分。這樣的觀念除了挑戰過去從歐洲現代性的觀點來檢視世界歷史的取向，更要求我們從一個全球化的架構來探討現代性如何於各個不同的文化社會中產生。⁹ 當我們採用這個觀念來詮釋歷史的變

7 Daniel Miller, *Modernit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Dualism and Mass Consumption in Trinidad* (Oxford: Berg, 1994), pp. 76-80.

8 David Strand, "New Chinese Cities," in Joseph W.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 to 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9 Björn Wittrock, "Modernity: One, None, or Many? European Origins and Modernity as a Global Condition," *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0), pp. 31-60;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0), pp. 1-30; 中譯文參見〔以色列〕S. N. 艾森斯塔特著，曠新年，王愛松譯，《反思現代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 36-66。

遷時，正好讓我們重新思考近現代中國是如何建構出自己獨特的現代性。

「近代」或「現代」這個概念被學者們用在具體的歷史分期，它完全是科學和客觀史學觀念引進中國之後才出現的，用來當作傳統的對立面。如果我們不再以現代化理論般的目的論或直線進步史觀，也不是以歐美、日本歷史發展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而是從現代性的角度來思量，既然現代性可能是多元而流動的，那麼我們對歷史的分期將會更有彈性。亦即我們不再將探討近現代史的眼光，局限在鴉片戰爭之後，或許「現代性」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自晚明以來的歷史發展。

立基於上述「現代性」的觀點作出發，本書的 14 篇文章都是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紮實的研究。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城市生活與文化的面向。現今討論現代性的學術潮流，逐漸從五四以來以德先生及賽先生的思想啟蒙及政治制度改變為主軸，而後重視經濟工業發展等大歷史敘述，轉移到較微觀的日常生活的不同面向，並藉此觀察社會脈絡的轉變。本書中賴惠敏與鄭揚文討論洋貨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張寧分析民國時期上海的回力球賽、連玲玲從性別看近代上海百貨公司的消費文化、巫仁恕探討蘇州旅遊空間的變遷，以及柯必德（Peter J. Carroll）分析 20 世紀初妓女在蘇州城市的地位，都屬於這樣的範疇。這些日常生活中外來的或是新舊交錯的元素，當時人如何感受？是抗拒還是接受？我們能用什麼樣的視野去審視衡量呢？

第二類的論文涉及到城市內群己關係的重新調整。包括孫慧敏討論上海減租運動中的房客聯合會、王笛論成都市茶社商業同業公會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劉迅分析上海道教改革社團、范純武分析鄭觀應的慈善活動與鸞堂組織的關係、康豹（Paul R. Katz）探討上海精英與佛教社群的關係、徐小群討論業餘和職業話劇在城市內的興起、林美莉看近代中國本土會計師的生計拓展，以及岩間一弘探討上海民營企業職員的重組與群眾運動。無論是成都、蘇州、上海，或其他的地方，近代中國城市的發展呈現與傳統城市不同之處，其一就是在群和己、人跟我、個人跟群體當中產生了一些新的構成，也就是說人聚在一塊的時候會有新的一些原理，有一些新的組織去把人定位為「一群」。這種結構上的原理，就是社會組織上出現新的遊戲規則（organizing principles）。這些新的遊戲規則的興起，可能是城市之所以為城市，之所以為現代化城市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上這兩大類論文經過細分之後，還可以看出近代中國城市中的幾個與現代性重要相關的面向，包括：外來消費與娛樂文化、城市空間與產業變遷、新社團組織的出現、新興職業人的誕生，以及城市與宗教的關係等，以下分別略述之。

外來消費與娛樂文化

當我們提到中國的「現代性」，最重要的一項特徵是中國與外來文化的關係——這在歐美工業先進國家不是問題，但是對於中國及其它許多工業後進國家，「現代性」與外來文化的衝擊經常被認為是同時發生，因此對「現代性」的討論，總脫離不了「洋」的因素。過去西方學者對於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動力，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最早的「挑戰—回應」模式強調外來的衝擊，而後來的「現代化」理論強調的是中國「西化」的模式。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都認為歐美列強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甚鉅。而中國的知識分子關於「華洋」關係的建構，不論是 19 世紀中葉的「中體西用」說，或是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說，多半從政治思想層面著手；至於「華洋關係」如何形塑日常生活，則較少討論。本論文集賴惠敏、鄭揚文、張寧的三篇文章，從一般老百姓的消費及娛樂活動切入，重新探索「華洋」關係。

賴惠敏利用原始檔案，分析乾隆朝北京的洋貨與旗人的日常生活，特別著重討論毛織品與玻璃兩項。賴惠敏的文章不但修正了過去經濟史學者，以為中國氣候溫暖，英國毛織品無法打開銷路，才轉而以鴉片為主要輸入品的說法，更讓我們看到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已經開始消費許多西洋貨。她的研究顯示乾隆朝由英國進口許多商品，包括毛織品與玻璃等，對北京的市民生活有顯著的影響，以致於北京旗人的穿著時尚有「洋氈勝紫貂」之諺，而旗人家庭所藏的玻璃製品也非常豐富。此外，北京的藏傳佛寺也以西洋傳入的毛皮與玻璃為材料，製作飾物。由此可見，中國並不保守或排斥舶來品，甚至 18 世紀北京城的旗人消費行為，還出現流行時尚的發展，以及許多模仿西洋貨而創新的器物。

鄭揚文亦論及洋貨，她試圖描繪出從清初到民國、甚至到今日，洋貨在近代中國的大脈絡。她主要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有些洋貨成功地被本土化，有些洋貨傳入後沒有多久卻消失無蹤。她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某一商品在單一階層的流行並不等於該消費文化（consumer trend/culture）的確立，必須要待此流行由部分人口擴至社會其他階層，由城市擴至其他非城市地區，特別是零售市場出現，才算該文化的確立。作者遂依此標準，對洋菊洋桃、自鳴鐘、洋布、自行車、啤酒、洋房等商品進行檢驗，分析清代乃至民國，上述各式洋貨傳入中國後是如何被選擇與被淘汰，並試圖找出其模式。作者指出洋貨進入中國後被揀選的模式不一，唯有與中國人既存的食衣住行等習慣相合者，才能跨過階級與城鄉的界線，由少數人的

玩賞收藏，轉變成日用必需，進而完全本土化，從此失去其原先的舶來意涵。

張寧研究的回力球「賭心思」一事，就呈現出本土傳統如何將外來物質轉化為在地化的實例。回力球自 1930 年代引入在上海後，在眾多洋賭博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回力球之所以與都會生活緊密相連，在於它展示了一定的現代性。首先，回力球場本身的外觀表現出所謂的「聲、光、化、電」，給予時人一種無法抹滅的摩登感。再者加上它所展現強烈的「光、熱、力」，特別是速度，及其所產生的強烈刺激感，成了上海都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幕。對日抗戰爆發後的上海成為孤島，城市居民心情苦悶而想尋求刺激，遂使回力球賽達到顛峰。此際一些老球迷發展出一套博弈理論，認為對回力球下注能否賭贏的關鍵，是在能否猜出「球路」——亦即能否事先掌握球場當局的「心思」。這種著墨於才智與技巧的運用，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在賭戲方面一向的傳統；而且在實際的運作上，也與當時的傳統賭博「花會」當中「賭心思」的想法接近。由是我們看到在地的消費者將一個最「洋」的東西，兼具現代性表徵的物質，不留痕跡地與傳統賭博結合。她的研究點出了傳統與現代間相互依違，以及近世以來城市外來文化的特性。

近代中國城市出現的百貨公司，也是屬於一種外來的消費文化。但是百貨公司所帶來的現代性，不只是「聲、光、化、電」而已，還改變了性別角色。連玲玲的文章就把讀者的視線從百貨公司帶到消費者，特別是女性消費者身上。百貨公司的興起，為婦女創造一個正當化的公共空間，讓她們可以從事購物、娛樂、社交等活動；消費者的角色使婦女在家庭資源分配上擁有更大的自主性。不過，在資本家的行銷策略操作下，百貨公司不但是女性消費的天堂，也是消費女性的場域：男顧客湧入百貨公司，只為了一睹櫃台小姐的風采，小報記者為了吸引讀者注意，爭相報導女店員的風流韻事。在百貨公司的例子裡，女性同時作為消費主體及被消費的對象，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消費者自主性的問題：在多大的程度上，消費是自我認同的主張？連玲玲的文章提醒我們，性別是個具「顛覆性」的分析工具，要求我們用新的角度重看城市的社會史。

城市空間與產業變遷

過去研究中國近現代城市史，涉及城市的空間問題時，多是由城市規劃的角度來作探討；本書有兩篇論文不約而同地都以蘇州為研究對象，但其著重的焦點則是城市空間與產業變化的關係。

首先是關於旅遊業與城市空間的討論，現代旅遊業（tourism）自 19 世紀興起後，舉凡商品化、制度化、普及化與快速跨越空間等，皆係現代性的特徵。巫仁恕的論文說明了現代旅遊業形成之前的明清時期，已經出現了豐富的遊觀文化，並且也可以看到許多現代性的特徵。直到 1920 年代中國第一個現代旅遊社成立，西方現代旅遊業的機制正式傳入中國，如同本書所提到的洋貨市場、迴力球、百貨公司等一樣，近代城市充分提供了這類新式娛樂業發展的環境。再就旅遊空間的變遷而言，從晚明到清末，蘇州旅遊空間的擴大或退縮，實與城市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至 1920 年代，蘇州旅遊活動邁向現代化，不但有火車與汽船等現代交通工具，縮小了旅遊所耗的時間，又有現代旅行社的成立；即使如此，蘇州旅遊的景點仍然是明清時代位於城郊與城內的古蹟，少有新建立的景點，由此可知現代蘇州的旅遊景點，仍然很難突破傳統時期空間上的藩籬。再者，明清時期的旅遊地景到現代後成為古蹟，一方面是傳統文化的象徵，被賦與國族認同與建構的意涵，同時又是現代旅遊業遊覽的重要景點。由是，作者指出現代蘇州的旅遊業，其實是建立在明清傳統遊觀文化的基礎上，可以說是「消費傳統的現代旅遊」（tourism of consuming tradition）。

柯必德的論文則是探討更為古老的行業——性工作與城市的關係，呈現出蘇州妓院在 1890 到 1930 年間歷經了遷移、廢止到合法化的過程。明清蘇州青樓文化之盛，集中在城西北閶門之內，成了蘇州著名的景觀。邁入 20 世紀以後，因為蘇州城外閶門與胥門之間擴建了新式的大馬路，為了繁榮當地的經濟，地方官員與企業主都主張將原來在閶門內的妓院遷移至此，於是蘇州的妓院被迫遷移以帶動該地的商業。此外，妓院所繳納的印花稅，還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稅源。但到了 1920 年代，尤其是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因為國民黨婦女部與其它社會改革團體極力呼籲禁娼，即使此舉對財政收入有相當負面的影響，蘇州市政府仍決定於 1929 年執行禁令。然而，商家卻認為禁娼導致了大馬路一帶的繁華不再，以及賣淫走向地下化。於是大馬路一帶的商家組織了民生社，要求政府將性工作合法化，以恢復該地往日的榮景。蘇州最終在 1932 年實行新的官娼制度，妓女分三等級登記後納稅，至此正式合法化。

從他的分析顯示性產業本是傳統道德與現代社會改革者所認為之「惡」，卻在官員、士紳與商人諧調一致的看法下，成了活絡城市經濟的重要動力。這和旅遊業的發展一樣，都說明了蘇州從傳統時期延續下來的產業，對城市在歷經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新社團組織的出現

中國的城市自明清以來，已形成一些以城市為中心的民間自治社團組織，如會館、公所與行幫等等。至近代以後，許多大城市又出現了新形態的社團組織，例如本書中王笛所論及的成都市茶社業公會，以及孫慧敏所探討的上海市房客聯合會，都是很好的例子。學界對近代中國城市社會團體的研究，主要是從兩方面切入：一是在「市民社會」理論的啓發下，探討城市社會團體如何透過對公共事務的參與，逐步建立其自主性與自治性，進而思考這些社會團體作為中國政治民主化推手的可能性。二是從「共同體」形塑的角度，觀察城市社會團體如何將從四面八方來到城市中的陌生人集結起來，逐漸發展出新的社會、政治秩序，凝聚成超越血緣與鄉緣的群體意識（特別是市民意識乃至國民意識）。¹⁰

相對於前人研究大都著重在討論城市社會團體的「公益」面，或是公益性的社會團體，孫慧敏和王笛更強調的則是城市社會團體維護「我群」權益的本質。王笛與孫慧敏分別以上海的房客聯合會與成都的茶社商業同業公會為例，討論 1920 年代上海的房屋承租人與 1940 年代成都的茶館業者，如何維護自身的居住權與經營權。成都市茶社商業同業公會，是從晚清的商幫轉型而成，繼承了 16 世紀以降兼具同鄉與同業關係的會館、公所之傳統，但在 1931、1936 年依法改組的過程，逐漸變成純粹的經濟性組織。而 1920 年代以後，上海市里弄之間所盛行的房客聯合會，儘管仍可能存在著同鄉、同業的關係，但最被強調的，卻是他們在城市中相同的房屋承租者身分與彼此之間的鄰里關係。這種結社紐帶使房客聯合會比先前的各種城市社團組織，呈現更明顯的「城市性」(urbanity)。這兩個例子也許可以說明近代中國城市與明清傳統城市所不同的現代性特徵，即在社團組織方面呈現了更趨同業性與在地化的傾向。

此外，這兩個例子都呈現了城市社團無法逃避的現實，也就是必須面對國家、政府，甚至政黨的力量，他們都得與之「協商」(negotiate)才可能實現其願。王笛指出民國時期的同業公會越來越依靠國家授予的權力來維護行規，特別是抗戰和內

10 朱英，〈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究回顧與思考〉，《江蘇社會科學》，2006 年第 6 期，頁 176-185；小濱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國家〉（東京：研文，2000）；岸本美緒，〈「市民社會」論と中国〉，《歷史評論》，期 527（1994 年 3 月），頁 56-72；Mary B.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Modern China* 19: 2 (Apr. 1993), pp. 158-182.

戰時期，使得茶社業公會較之過去的行會，獨立和自治性大為減少。這顯示國家對社會組織的控制日益加強，甚至深入到對城市社會的基層，遠超過明清時期的城市與同時期的鄉村。其實公會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是相互利用的，兩者會盡量透過協商來避免直接對抗。因為政府也需要公會作為中介，才易將政令貫徹至社會基層。又如上海的房客聯合會自成立之初，就是得透過請願來爭取政府的認可與支持。此外，國民黨一度以 1926 年入主武漢地區的組織動員經驗，來發展上海的房屋減租運動。不過，孫慧敏也指出不宜過分誇大國、共兩黨的影響力。因為政黨組織的「領導性」房客團體，隨著政黨政策的改變，他們的立場也隨之變化。而 1927 年房屋減租運動的主力，並且還一直持續下去的，其實還是那些里弄型的房客聯合會。由此可見，近代中國城市的社團組織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仍有跟政府討價還價的空間。

新興職業人的誕生

近年來，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是以近代中國城市裡興起一大批以特殊專業謀求生計的新興職業工作者為研究目標，探討包括律師、醫師、工程師、會計師、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等人物的執業活動，以及「職業」在城市之中作為一個區分群己之別的身分表徵，又如何成為集眾引領社會的動力來源。這些新興職業的參與者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結社組織，對內增強成員彼此之間的內聚力，對外則與政治勢力作協商或是對抗。一般認為，這些群體彼此之間的同質性不高，存續歷史也相對短暫，然而，其行動的總和，卻是構成中國城市社會成熟的標誌。這些人的出現是由於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下的結果，他們尋求國家的認可，以保護他們的利益，國家也樂意與它們合作，以利現代化建設的推動，雙方各得其所。¹¹ 關於此一重要議

11 關於此一課題的相關討論，可參見徐小群、朱英、孫慧敏、陳同、雷祥麟、連玲玲、岩間一弘、林美莉及魏文享等人的著作：Xiaoqun Xu, "State and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Rise of Shanghai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1912-1937,"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徐小群，《民國時期的國家與社會：自由職業團體在上海的興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孫慧敏，〈建立一個高尚的職業：近代上海律師業的興起與頓挫〉（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 6 月）；陳同，〈社會變遷中的上海律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4）；Sean Hsiang-lin Lei, "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 1910-1949," (Ph.D. dissert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1999)；岩間一弘，〈民国期上海の新しい中間層〉（東京：東京大学博士論文，2005）；Ling-ling Lien, "Searching for the 'New Womanhood': Career Women in Shanghai, 1912-1945," (Ph.D. dissertation, California, Irvine: University of

題，本論集內有三篇論文，分別是徐小群、林美莉與岩間一弘有關話劇演員、會計師與民營企業職員這三類新興職業人群的探討。

新興職業人群的出現與活動，與近代城市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本土的會計師之所以崛起，是因為近代中國城市內本土工商企業的興起，提供了許多本土會計師執業的機會。又如，職業話劇演員只能在城市裡生根成長，這和近代以來城鄉之間物質文化生活和教育程度上的差別分不開。包括演員說國語、劇場設備以及商業化，都只有在城市的環境下才有這樣的條件。因而職業話劇成為近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城市大眾的消費者中，有相當大的數量正是民營企業的職員。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的城鄉差距，到了近代以後漸形漸遠，和傳統城鄉連續一體的情形迥然不同。至 20 世紀的 2、30 年代，城市中形成新興的社會階層。

新興職業之所以稱他們為「新」，因為他們與傳統的相關從業者有很大的差異。例如，職業話劇演員相較傳統戲曲演員，更強調戲劇改良與藝術性。會計師和傳統的銀錢賬房不同之處，在於處理業務時具有成本會計這樣的現代觀念。同時，越來越多自居新興職業中人，包括民營企業職員，他們在城市之中生產，也在城市之中消費，不時地體現出「現代」式的生活經歷和社會意識，也可以說他們的經驗呈現出當時代的「現代性」。因此，就個人的初始動機而言，新興職業者固然都是以謀營生計作為目標，然而，當我們探究其終極的關懷，適可目睹到近代中國社會在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可能途徑。

近代中國城市提供新興職業的從業人口施展其抱負的舞台，然而，這類人在從業時也會遇到許多問題。其中極為明顯的一個現象，即是由於對「新」的標榜和追求，而引起「舊」的冷眼和敵意。一如林美莉所描述的，即便是近代新式企業，仍有不少業主根本不相信會計師，寧願用傳統的銀錢賬房來管賬；會計師也常會遭到社會的責難，社會輿論常將他們視為助資本案逃稅的幫兇。更為重要的是，政治勢力對於他們這股不斷成長的力量，一直具有戒慎恐懼的心理，進而以強大的壓力阻擋其發展。例如林美莉指出影響會計師生存的最大外在因素，是政府決策與政治勢力的提出與介入。國民政府的稅制改革，給會計師帶來生計契機，尤其是在重慶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朱英，〈近代中國自由職業者群體研究的幾個問題——側重於律師、醫師、會計師的論述〉，《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46 期 4（2007 年 7 月），頁 65-73；林美莉，〈專業與政治：上海會計師公會與國民政府的互動，1927-1931〉，《近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497-516；魏文享，〈近代上海職業會計師群體的興起——以上海會計師公會為中心〉，《江蘇社會科學》，2006 年第 4 期，頁 198-205。

期，呈現出本業榮景；但在 1957 年之後，因為共產黨政府將之劃為右派，會計師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岩間一弘則更為清楚地呈現了民營企業的職員到 1949 年以後，受到政治力的干預，共產黨動員引導他們走向鬥爭，職員乃以「政治表演」作為因應或是生存之道。經過了政黨力量的強力改造之後，新興職業人群逐漸喪失自主性，而被統攝並內化於國家的管理機制中。

城市與宗教

過去有關城市的社會史方面，雖然已有很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宗教的角色似乎被低估了。就以盛極一時有關中國城市「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討論為例，大部分的學者強調像會館、公所這類社會組織的重要性，卻對宗教性質的社團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未有適當的評估。¹² 然而，就像本書蒐錄的論文所顯示的，在中國近代城市裡最重要的公共活動，其一就是宗教信仰的活動。這也意味著任何關於中國「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的討論，不應該忽略宗教活動的重要性。¹³

再者，也有學者已注意到，激勵城市精英份子領導或參與慈善活動，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因為研究城市精英的史料，包括報刊雜誌與檔案中，呈現他們有關宗教信仰的資料不太多，以致於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宗教網絡被忽視。¹⁴ 但是

12 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lliam T.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 3 (Jul. 1990), pp. 309-326;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9: 2 (Apr. 1993), pp. 143-153;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1920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3 更多相關的討論，參見 Martin C. Yang,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ness in a Chinese Socialist Facto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22 (Jul. 1989), pp. 35-36; Kenneth Dean, "China's Second Government: Regional Ritual Systems in Southeast China," 收入王秋桂、莊英章、陳中民編，《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1)，頁 77-109。

14 例如 Mary Rankin 探討晚清精英份子的研究。強調他們在社會活動方面的自主性 (activism) 運作，卻排除宗教領域的活動。見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pp. 143-147。又如朱濤研究晚清華北精英階層的救荒活動，雖然花相當大的篇幅討論「福報」的觀念，卻未注意到此觀念與佛教思想的關聯性。參見朱濤，〈江南人在華北——從晚清義賑的興起看地方史路徑的空間局限〉，《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114-148。

在明清時期，已可以見到精英階層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而積極組織善會、善堂等慈善救濟團體。¹⁵

本論集中有三篇論文，都涉及到上述的問題。鄭觀應（1842-1922）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啓蒙思想家和實業家，向來被認為是現代化的推手，但在長期寓居上海的歲月，鄭觀應同時也求道、扶鸞、辦善、求仙，過去研究者對其這一與「進步」不符的面相，多簡單帶過，范存武則將之放在宗教史的脈絡下，特別是與清末民初上海善堂網絡的擴展相連結，進行分析。鄭觀應推動和參與慈善活動的上海善堂，其實與鸞堂相互結合。鄭觀應積極救世，背後有極大的動力就是來自宗教的力量。他有著豐富的求道經驗，因而相信扶鸞乩示，也相信鸞堂所發展出來的劫變思想與救世理論。在鄭觀應的身上，讓我們看到傳統宗教觀與現代「進步」思想並存的例子。

康豹（Paul Katz）透過王一亭（1867-1938）的個案研究，試圖探討清末民初上海的精英份子，在面對現代中國的轉變與發展時，如何調適傳統宗教的信仰，以及透過宗教實踐來建立社會精英的地位。作者除了詳述王一亭的生平以及其佛教思想以外，尤其關注到王一亭參與和組織的佛教慈善活動，以及扶乩宣教的特色。據此顯示了在一個現代城市的精英份子身上，是呈現傳統和現代同時並存的多元文化特徵，這也說明近代中國城市社會與城市文化中特殊的現代性。

劉迅則以陳撝寧（1880-1969）為例，分析 1930 至 40 年代間，陳氏於上海所提倡的道教改革運動。陳撝寧在思想上主張仙學可以養生，可以救國，並且提高道教思想的歷史與文化地位，以反駁儒佛之批評，並以此對抗外來文化。同時陳氏也用現代科學來研究道教的外丹，甚至成立實驗室，闡述道教外丹具有現代化學的先驅地位，並獲得當時科學家之肯定。同時，他又嘗試用現代的科學語言與觀念來解釋道教的內丹思想。作者指出陳氏以現代科學融入傳統道教的身體修練與宇宙觀，而透過這樣混合與選擇性的改革，重新塑造了現代性的道教論述。由此說明過去認為現代中國城市精英傾向西化而反宗教、反迷信的看法，實與歷史事實有段落差。

15 參見 Joanna Handlin Smith, "Benevolent Societies: 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2 (May 1987), pp. 309-338; Joanna Handlin Smith, "Chinese Philanthropy as Seen through a Case of Famine Relief in the 1640s," in Warren F. Ilchman et. al., eds., *Philanthropy in the World's Tradi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3-168. 又可參見 Andrea Janku (燕安黛), "Sowing Happiness: Spiritual Competition in Famine Relief Activiti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民俗曲藝》, 期 143 (2004 年 3 月), 頁 89-118。

回頭再看城市化對宗教發展的作用，從上述三篇論文中，又可以看到近代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傳統宗教發展更多的養分。尤其是上海，康豹的論文提到在 1910 至 1930 年代之間，就出現許多現代的佛教團體，以及新興的宗教團體（學者稱之為「救贖團體」）。這些團體以城市為基地，建構了相當廣的社會網絡。如范純武觀察到鄭觀應以上海善堂網絡為基礎成立的「上海辦賑公所」，發揮了跨省際救災的重大功能。而城市內的現代傳媒，又提供這些宗教社團更緊密的聯繫與結合。如劉迅指出，上海的現代出版機制，透過月刊或月報這類傳播媒介，使得民初以城市為中心出現了道教公共空間 (Daoist public space)。此機制同時也跨越區域與社會階層的界線，使得有志於修道者可以共同參與和分享個人經驗，形成一個想像的族群 (imagined community)。由此改變了傳統道教的修道模式，且突破了傳統修道中的性別障礙。

小 結

本書的研究成果，相較於以往的近現代城市史研究，至少有三方面的特點。首先是相對過去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詮釋近現代中國城市史的發展，而強調城市管理與城市規畫方面，或是偏重城市內中產階級或工商業者的研究，本書分析的面向則是從現代性的角度出發，更著重在城市裡人們的日常生活；除了消費、娛樂、職業與社團等物質面向，還包括了宗教信仰的精神面向。

其次，在解釋方面，本書並不像過去預設了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狀態，也不誇大兩者的關係，而是以更細緻地分析來強調兩者間的互動情況。尤其是關於城市「群體」的探討，本書的諸篇論文皆由實際且利益取向的角度出發，討論城市社會結構的特質，點出城市內群己關係的改變，如何影響近代城市的公共政策層面。特別是群體與政治的糾結，更是本書揭之而猶待未來更進一步發揮的角度。

最後，本書也企圖跳脫過去中國近代史的分期觀，而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結果顯示有些看似現代性的事務，其實是傳統的延續，如現代城市的旅遊業與性產業。就像我們過去一直認為是 19 世紀以後才引人注目的「華洋」問題，其實早在明清時期已經出現，而且「華洋」二者不一定是對立的。而西方新式文化的輸入，無論是新奇的洋貨，或是像回力球這類外來娛樂，也需要與傳統接榫，才可能落地生根。新舊的雜陳與融合，還可以在宗教信仰裡看到。現代性的啟蒙、理性與科學等層面，原本與中國傳統宗教的思想與實踐有明顯的矛盾與衝突，卻在城市裡的知